

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AL

Selected Papers for
Celebrating the 3rd
Anniversary of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TRANSITIONAL MODES ON DEMOCRATIC OUTCOMES)

《边疆无界：万象共生的人类观》

《论正当：一种元伦理学的解读》、《多元社会的重叠共识：正当与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论述》

《古今：现代性的天命》、《死亡驱力的四个时刻——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考察》

《从：邓小平问题，到：转型法哲学——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

《情理：变通型正义观理论建构初论》、《超社会体系——关于文明人类学》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HISTORICAL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NEW ORIEN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DIAGNOSING AND DESIGNING DEMOCRACY)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边疆无界：万象共生的人类观》

《论正当：一种元伦理学的解读》

□ 邓小平 主编

《多元社会的重叠共识：正当与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论述》

《古今：现代性的天命》、《死亡驱力的四个时刻——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考察》

《从：邓小平问题，到：转型法哲学——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

《情理：变通型正义观理论建构初论》、《超社会体系——关于文明人类学》

(DIAGNOSING AND DESIGNING DEMOCRACY)

政治之维

●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紀念文集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边疆无界：万象共生的人类观》

《论正当：一种元伦理学的解读》

《多元社会的重叠共识：正当与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论述》、《古今：现代性的天命》、《死亡驱力的四个时刻——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考察》

《从：邓小平问题，到：转型法哲学——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

《情理：变通型正义观理论建构初论》、《超社会体系——关于文明人类学》

(DIAGNOSING AND DESIGNING DEMOCRACY)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边疆无界：万象共生的人类观》

《论正当：一种元伦理学的解读》

《古今：现代性的天命》、《死亡驱力的四个时刻——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考察》

《从：邓小平问题，到：转型法哲学——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

《情理：变通型正义观理论建构初论》、《超社会体系——关于文明人类学》

政治之维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纪念文集

□ 邓正来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之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纪念文集/邓正来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309-08544-0

I. 政… II. 邓…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7989 号

政治之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纪念文集
邓正来 主编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8.75 字数 461 千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44-0/C·217
定价: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知识转型”时代的学术担当*

邓正来^①

2011年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正式运行的第三个年头。自复旦高研院成立以来,我一直强调:复旦高研院的创立是为了同时突出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和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则,以期“高等研究”的建制超越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认识论误区与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进而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

我的这一认识既不是一时的冲动,也绝不是出于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而是有着长期的充分的理论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就在努力推动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事业的逻辑延伸。事实上,晚近以来,我本人至少经由四个方面的学术努力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我所谓的“知识转型”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

* 感谢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和孙国东博士对本文写作及本文集编纂的贡献。

①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题,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是关乎我们如何认识和建构新世界秩序的大问题。我经由细致研究后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夺”之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一个如何重新认识世界的大问题。换言之,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且也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认识乃至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问题。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以及我们对新世界秩序的认识予以型构的。

第二,不仅如此,从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来看,当下世界事实上正处在“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它既是“第一现代世界”(工业社会)和“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共存、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一尊世界观的世界”。从历史上看,欧洲在17世纪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仅奠定了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格局,也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框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认的“主权至上”和“主权平等”原则既为西方从中世纪神权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三百年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基础。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社会的进一步复杂化,“全球风险”^①的普遍存在已使当下世界处于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之中。而“全球风险”的普遍存在不仅使得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取代了财富生产和积累的逻辑而成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而且也使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定的世界观(即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性世界观)面临着根本的挑战,进而使得当下世界成为一个缺失整全性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安排支撑的、“没有一尊世界观的世界”。这不仅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即将开始一种新游戏,老游戏的规则和基本概念不灵了,尽管人们想继续保留老游戏。老游戏本身尽管头衔很多,比如‘民族国家’、‘民族工业社会’、‘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福

① 这种“全球风险”主要是:由富裕所引起的生态破坏以及科技—工业危险,由贫穷所引起的生态破坏以及科技—工业危险;包括由于贫困引起的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生物物种的急剧减少、有毒工业垃圾的进口和被淘汰的重大技术的引进,等等,以及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引起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自我毁灭的危险。参见贝克:《全球化危机》,孙治本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57页。

利国家’等等,但是终究行不通了”^①。而且,它还意味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中国鲜活思想和智慧中寻求可能的思想资源,为建构我们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世界观和新世界秩序作出我们的历史性贡献。

第三,从“世界结构”与中国的关系来看,当下中国所进入的“世界结构”对中国构成了基于“承诺”的支配,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其实为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我看来,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乃是被纳入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这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即给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但我们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规则的能力,其前提乃在于:作为“生产思想”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否则,我们所获得的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作出我们自己独特的智性贡献,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四,从知识的性质来看,社会科学实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此前,正是因我们对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所形成的全球化话语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秩序在根本上乃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依归的。因此,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能够以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为灵感之源、以基于中国视角对“世界理想图景”的想象为理论依据而建构我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推动这种理论走向世界。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以自己的中国深度研究和新世界观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

^① 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蒋仁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二

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成果走向世界呢？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仅可以适用于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西方化”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二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文化为支撑的，尤其是以存活在中国人生命里的那些“生存性智慧”为支撑的，因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然是“地方性”的。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用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回答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据此，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重构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地方，更是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的重中之重^①。

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要用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去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尤其是那些与历史紧密勾连的流传在中国人生命之中的鲜活的“生存性智慧”；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种普世有效的理论方法或道德准则，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应当对既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进行反思和批判，进而在悬置西方理论、中国意识形态和各种道德判断前见的情况下，经由发现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生存经验而建构起能够真正有效解释中国这个文明体生存发展之道的“范式”；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

^① 参见邓正来、Gudmund Hernes：《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邓正来与 Gudmund Hernes 的学术对话》，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 年秋季卷。

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更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经济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当下“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文明中国。

复旦高研院正是基于对上述学术担当的深刻认识而建立的。我们秉承“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确立了“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并坚持“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路径,追求“扎根复旦、辐射上海、影响中国、走向世界”的建院之道,以期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以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走向世界,同时推动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

三年来,我们正是在上述理念和定位的指导下,在团队建设、学术活动、科研项目、学术成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努力。

我们按照学术的标准从国内外引进了四位著名学者:原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原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郭苏建和原美国卡尔顿学院人类学教授纳日碧力戈被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UCLA 亚洲研究所主任王国斌被聘为复旦高研院特聘讲座教授。我们还引进了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刘清平,以及中国著名政治哲学学者、原南京大学西方哲学学术带头人顾肃教授,并引进了陈润华、吴冠军、孙国东、林曦、杨晓畅等数位颇具学术潜力的青年学术骨干,初步搭建起了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研究团队。

在学术活动方面,我们在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及学术席明纳序列中按照“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明确了各个学术活动的旨趣和定位。我们专门设立了两个常规性的品牌讲坛:一是旨在拓宽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视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水平的常规性学术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二是旨在促进中国深度研究的常规性学术讲坛——“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我们专门设立了两个常规性的品牌学术会议:一是旨在引领中国社会科学界在世界秩序重构方面作出理论贡献的常规性学术会议或学术论坛——“未来世界论坛”,二是旨在推进中国学者加强中国深度研究的常规性学术论坛——“重新发现中国论坛”。同时,为了加强中外学者之间的深度学术对话,我们还分别设立了“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与“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三年来,上述各类学术活动共举办了近一百四十场(次)。迈克尔·桑德尔、约瑟夫·拉兹、乌尔里希·贝克、弗朗西斯·福山、杰弗里·亚历山大、约瑟夫·奈、王国斌、涛慕思·博格、罗伯特·阿列克西、理查德·沃林、菲利普·施密特、戴维·特鲁贝克、王

斯福、萨林斯、汤一介、朱维铮、周其仁、邓晓芒、汪晖、周国平、陈嘉映、陈来、童世骏、张文显、俞吾金、何怀宏、万俊人、王缉思、秦晖、张维迎、李银河、王铭铭、许纪霖、赵汀阳、温铁军、樊纲、陈平原、张旭东、沈志华、姜义华、葛兆光、葛剑雄、陈思和、陈家琪、孙周兴、桑玉成、张小劲、宋新宁、萧功秦、朱学勤、郑成良、林尚立、黄仁伟、杜维明、公丕祥、陈弘毅、石之瑜、曹锦清、赵鼎新、赵文词、秦亚青、王逸舟、杨大利、阎云翔、刘康、文贯中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都作为上述学术讲座、席明纳的主讲嘉宾或学术会议的发言者参与其间。

为了推动中国年轻学者加强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我们在高研院有限的科研经费中拿出部分经费设立了“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项目”，包括一般项目和关键词特别项目，分别资助了二十项和十三项。同时，由我主持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重大委托项目“当代中国发展论丛”项目，即“中国优秀学术论文中译英项目”，力图通过持久的努力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集中翻译成英文，大规模地向国际学术界推介，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行探索性的努力。目前，我们已在新加坡世界科学技术出版公司出版了三辑，主题分别为：《中国经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全球化与地方化：中国视角》。为了形成高研院品牌性的研究优势，我们还在复旦大学“985”三期项目中成功申报了“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研究”课题。该课题首期项目经费五十万元，拟从对当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入手，力图形成高研院促进“中国深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三年来，我院研究人员发表了各类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编著、译著、学术期刊共计近一百部（期）。其中，在 Rowman & Littlefield-Lexington, Palgrave Macmillan 及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等出版机构出版英文学术著作八部；在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ian Philosoph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及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等英文学术期刊或学术丛书中发表英文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也已由日本著名学者石川英昭教授翻译成日文出版。

此外，复旦高研院还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共同编辑“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利用耶鲁大学的国际化网路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出

去提供了一个高层次平台。目前,我们已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签订了合作研究项目《中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与基层民主和治理的关系》,力图通过中印之间的比较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及发展中国的基层民主和治理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努力。我们不仅主导建立了“中国研究与学术期刊全球论坛”,而且还正在以核心成员身份创建全球十二家优秀高研院学术联盟(剑桥、普林斯顿、斯坦福、巴黎、柏林、希伯来、东京、圣保罗、南非、印度、荷兰及复旦)。我们希望,通过全球优秀高研院之间的整体联动与深度合作,可以更为实质性地参与全球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对话与合作。

三

上文只是简要勾勒出了我们在这三年内取得的部分成绩。坦率地讲,回首我们三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有理由感到振奋。已经有不少朋友告诉我:他们都不相信复旦高研院是仅仅成立三年的一个学术机构。我想,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觉”,实是因为我们在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下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做了一些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本应做的事情。

为了部分展现我院专职研究人员的学术风貌,我们编辑整理了这本论文集,其中收录了我院研究人员在加盟复旦高研院期间的部分代表性成果。尽管我院研究人员学术背景横跨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关怀却是我们共同的旨趣所在。我们选择“政治之维”(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al)作为书名正是为了体现我们的这一共同旨趣。

在此,有必要对这个书名做一番简要的解释。首先需要在学术上进行分疏的是“the political”与“politics”之间的区别:在英语学术世界,“politics”乃是指议会、选举、政治代表、党派,乃至工会、公民参与等等这一套既定的政治系统、政治机构、政治空间和政治行动,质言之,“politics”被视为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系统——政治系统,这个系统有其自身的疆界、特征、行动模式;“the political”则并不是指这种社会现实中的政治制度,而是使得这种政治制度最初得以生成的那种根本性状况。按照 Chantal Mouffe 的说法,它“是每个人类社会内在固有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决定着我们的存在论状况(ontological condition)”。她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指出,“politics 指的是‘ontic’(日常实在)的层面,而 the

political 指的是‘ontological’的层面”^①。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处理“politics”的问题——换言之,处理具体的、历史性—经验性的特殊问题;而后者则面对更根本的“the political”的问题,即政治共同体的构成性(constitutive)原则或构成性状况。从存在论的层面看,包括宪政状态在内的任何具体的实定政治状态都是极其例外的、由诸多历史偶然性要素碰撞出来的特殊状态,而“the political”却是更为根本的常态,是潜藏于任何实定秩序底层的存在论状况。

这本论文集的核心篇幅,都是围绕“the political”的诸种维度而展开的,比如说多元文化问题(顾肃、纳日碧力戈)、正义与正当问题(刘清平、林曦)、民主问题(菲利普·施密特、郭苏建)、文明比较与超社会体系(王国斌、王铭铭),以及学术史角度的思想纵论(吴冠军、陈润华)。我的论文是我对我一直提倡的“生存性智慧”观念的初步阐发,而孙国东的论文则是对我关于“理想图景”之思想的一个纵深性的考察与推进。这两篇论文表面上似乎和“政治之维”有一定的距离,然而,它们恰恰关涉的是中国社会的制序(ordering)问题,而非仅仅秩序(order),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本书论题之另一个独特的“维度”。

在复旦高研院成立三周年之际,我们以论文集的方式向学术界集体展现我们的学术风貌,不仅旨在提请学术界检视我们的学术成果,更旨在记录我们在这个“知识转型时代”自觉担当时代使命的学术实践。我们深知,无论是我们的学术成果,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其他学术尝试,它们相对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实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们更相信: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

最后,我必须指出:复旦高研院的事业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复旦大学,属于上海,更属于中国。我们是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路,是在创建一个独特的符合知识生产规律、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知识学术之家”,是在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请允许我们对关心、支持复旦高研院成长和发展的海内外学术同道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因为我们深知,如果没有诸位的帮助,我们的任何成绩都是不可能的!

① Chantal Mouffe,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 p. 3; Mouffe, *On the Politic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8.

CONTENTS

目 录

序言——“知识转型”时代的学术担当	邓正来	1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邓正来	1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Transitional Modes on Democratic Outcomes	郭苏建等	26
边疆无界：万象共生的人类观	纳日碧力戈	65
论正当：一种元伦理学的解读	刘清平	76
多元社会的重叠共识、正当与善 ——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论述	顾 肃	99
古与今：现代性的大命	陈润华	111
死亡驱力的四个时刻 ——一个政治哲学史的考察	吴冠军	137
从“邓正来问题”到“转型法哲学” ——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	孙国东	183
情理：变通型正义观理论建构初论	林 曦	251

超社会体系

——关于文明人类学	王铭铭	272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Historical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New Orien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王国斌	324
Diagnosing and Designing Democracy	菲利普·C·施密特	346

附 录

一、国内外著名学者对复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拓展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计划：扩大中国社会科学的贡献，针对当下中国议题和全球事务发言	王国斌	364
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那些日子	菲利普·C·施密特	367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约瑟夫·拉兹	371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杰弗里·亚历山大	373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涛慕思·博格	375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约翰·基恩	376
致邓正来教授的信	裴宜理	377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个人评论	阎云翔	378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胡志德	380
扎根中国 走向世界	秦绍德	382
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纪念	林毅夫	384
祝愿复旦高等研究院率先成为中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堡垒	张维迎	386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平台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评议	张文显	388
把更多优秀学子吸引到社会科学领域来		
——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三周年	童世骏	391
成绩斐然 走向成熟		
——祝复旦高研院成立三周年	沈国明	393
从复旦“高研院”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问题	桑玉成	395
业绩巨大,不足明显,佳境可期		
——复旦高研院建院三周年简评	张曙光	398
复旦的学子有福了	何怀宏	402
“根据中国,直面世界”		
——有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求才育人之道		
.....	方流芳	404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的评议	高 毅	406
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分析	张小劲	408
三、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专职人员简介及其代表性论著		430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邓正来

引言 重新发现中国

晚近以来,特别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诸如“西方的终结”、“中国拯救资本主义”和“中国模式”这样的话语充斥着中国社会科学界。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诸如此类的话语,有一点是显见不争的,即世界和中国情势在这些年的变化的确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and 机遇,也为世界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关于这一论题,我已于此前的数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题域下进行过较为细致的学理论证。它主要包括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重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转型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根据人的认识、利益和传统等因素被建构或重构的博弈进程。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表明,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经由重新形塑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而展开的“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被

* 本文发表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 年第四期(总第 81 期)。本文初稿是我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联合主办的“生存性智慧: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基调发言,后又在“第一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上作为基调报告请大家讨论。在正式发表之前,我对整个文章又做了详尽的修改。因此,感谢两次大会的与会学者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尤其要感谢我的助手孙国东博士和林曦博士对本文的最终成稿所作出的贡献。

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因此,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经由重新形塑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话语建构”问题,而其核心结果也就表现为话语争夺权的问题。对中国而言,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主体性,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形塑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提供足以影响全球化进程的“理想图景”^①。

第二,当下中国所进入的“世界结构”对中国构成了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在深层的意义上为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经由加入 WTO 等国际组织而实质性地进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乃是被纳入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和承诺。这种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在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和调整全球化发展方向的资格。但是,我们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世界结构规则和调整全球化发展方向的能力,其根本前提还在于:作为“思想库”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关于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理想图景”;否则,我们所获得的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②。

第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知识实是一种以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在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③。当然,在面对全球化世界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更明确地认识到,现代性以降的那种逻辑知识(knowledge of logic)以及与之相应的那些制度安排,一方面根本无法为这个世界提供新的世界观,也无法支撑这个世界的运行;另一方面还彻底遮蔽或否弃了人赖以存在或此前世界得以演化的“生存性智慧”。因此,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

① 邓正来:《谁之全球化? 何种法哲学?》第四章,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②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9—23 页。

③ 同上书,第 266—267 页。

判性品格,只要我们在充分意识到逻辑知识之根本局限的前提下直面中国人(也包括其他民族)的“生存性智慧”,我们同样能够以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为灵感之源、以基于中国视角对“世界理想图景”的想象为理论依据而建构我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思想,进而推动这种思想走向世界。

正是主要以上述理论洞见为基础,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西方知识”、“复制西方理论”、“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学术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显而易见,这种“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自主性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

然而,上述所有讨论只是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社会学科实现“知识转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我以为,我们还必须强调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要用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去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尤其是那些与历史紧密勾连的流传在中国人生命之中的鲜活的“生存性智慧”;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种普世有效的理论方法,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应当对既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进行反思和批判,进而经由发现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生存经验而建构起能够真正有效地解释中国这个文明体生存发展之道的“范式”;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更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经济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当下“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文明中国。在我看来,这些论题至少包括了如下几个在逻辑上密切相关的方面:(1)关于“中国经验”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勾连的理论阐释;(2)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3)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普适性资源的发掘和重构;(4)关于中国人“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的理论阐释,等等。

本文将对上述第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力图将其同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勾连起来做一番尝试性的考量。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我将主要阐释我所提出的“生存性智慧”这一概念,并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初步建构一种我